

明成化至正德间

苏州诗人

徐楠

著

研究

A STUDY OF THE SUZHOU POETS DURING
CHENGHUA-ZHENGDE PERIOD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明
成
化
至
正
德
间

苏州诗人

徐楠

著

研
究

A STUDY OF THE SUZHOU POETS DURING
CHENGHUA-ZHENGDE PERIODS



K825.6
X77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研究/徐楠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5097-1454-6

I. ①明… II. ①徐… III. ①诗人—人物研究—苏州市—明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4677 号

明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研究

著 者 / 徐 楠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段景民 侯培岭 魏小薇

责任校对 / 李 腊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7.2

字 数 / 30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454 - 6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晚明文学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近些年来，相关的研究更为兴盛。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晚明独特的文化特点与价值被不断强化时，可能会遮蔽晚明之前的文学创作，也会带来一些疑惑：这一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或文化转型的“晚明”究竟是怎样在看似平稳的社会格局中出现的？它的诸多特点只是商品经济兴旺发达的产物吗？揆情度理，“晚明”也应有它的前世今生，它的种种新气象，应该可以在之前找到某种精神来源。而其最切近的源头，从时间上来说，当然是明代成化至正德年间；从空间上来说，则非苏州莫属。徐楠的《明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研究》正是通过对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全面考察，探讨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历史价值。从徐君选定这一研究课题时，我就期待这一研究是对成化至正德时期诗歌的深入探讨。同时，成化至正德时期诗歌作为明代诗歌发展的一环，对它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看清诗歌创作历史特点的前因后果。

我的期待没有落空，徐君在本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对以往学界有关明诗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明代文学的某些总体判断有所修正。比如作者通过对明初严政意图、效果的细致辨析，揭示了明前期苏州文苑真实的外部环境，从而指出学界关于该时段苏州文苑“停滞”说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苏州诗人与茶陵派交友细节的考察，说明了明前中期台阁与山林两个文人系统关系的逐渐改善；通过对苏州诗人创作特点与理念的分析，阐发了他们以自由随意、不受具体写作范式羁勒为要义的漫兴精神。诸如此类精解胜识，或为前人成见的纠偏正误，



或为深入探讨的自立新说，要皆持论有故，足资参考。

这里，我想举一个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具体例证。由于我自己的研究长期偏于小说，对明清诗文并不熟悉，成化至正德间的诗人，大概只略微读过沈周、唐寅的一点东西，别的就几乎一无所知了。但沈、唐之外，还有一个人吸引过我，那就是一向被视为吴中傲诞之风代表人物的桑悦。桑悦为人怪诞，好发大言。《明史》和野史笔记上都有一些记载。比如《明史》桑悦本传上说：

〔桑悦〕书过目，辄焚弃，曰：“已在吾腹中矣。”敢为大言，以孟子自况。或问翰林文章，曰：“虚无人，举天下惟悦，其次祝允明，又次罗玘。”为诸生，上谒监司，曰“江南才子”……学士丘浚重其文，属学使者善遇之。使者至，问：“悦不迎，岂有恙乎？”长吏皆衔之，曰：“无恙，自负才名不肯谒耳。”使者遣吏召不至，益两使促之。悦怒曰：“始吾谓天下未有无耳者，乃今有之。与若期，三日后来，渎则不来矣。”使者恚，欲收悦，缘浚故，不果。三日来见，长揖使者。使者怒，悦脱帽竟去。使者下阶谢，乃已。……居家益狂诞，乡人莫不重其文，而骇其行。……居长沙，著《庸言》，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

他的这些事迹，明阎秀卿《吴郡二科志·狂简》的记载更为详细生动（有关桑悦的记载大约都采自此书），如学使召见他，他拒不相见，声称：“即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后来去见了，又长揖立，不跪。按察厉声责怪他为何不跪，他说：“汉汲长孺长揖大将军，明公贵岂逾大将军？而长孺固亡贤于悦，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脱帽径出。后来，他调官柳州，不想就任。人问之，辄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夺其上，不安耳。”如此等等。在传记后面的“赞”中，阎秀卿对桑悦有欣赏、有惋惜，也有分析，态度较为客观，与他为狂简之士作传“任其真而全其神”的初衷一致。不过，这一态度似乎只有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表示了认同。阎

秀卿以后的主流看法，都对桑悦持不同程度的非议。

余识也陋，引起我关注的正是上面这些奇闻逸事以及人们不同的解读。也就是说，我还是习惯性地把他当作一个类似于小说叙事中的“奇人”来看待的。不过，在提倡“君子谦谦”的文化传统背景下，桑悦的言谈举止即使不说是惊世骇俗，也多少让人刮目相看。如果把上述言行之狂，只看作一个文人的疏狂傲慢，恐怕也有遗憾。《明史》“文苑传”中曾这样描述：“吴中自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常熟有桑悦者，字民怗，尤怪妄，亦以才名吴中。”把桑悦作为吴中放诞不羁的最极端代表之一，而不是孤立地看待他的言行，我以为是符合实际的。

缘乎此，我也翻阅过桑悦的《思玄集》，印象中虽有些散漫处，却并没有特别出奇的地方。至于他自以为“穷究天人之际”的著作《桑子庸言》，似乎也如《四库总目提要》所说，实无甚精奥。一个人言行及其影响与写作的一致性及反差究竟有多大？桑悦的出现只是一个特例，还是与当时的文坛有着某种关系？他在文学史上是可以忽略的异数，还是与文学发展的潮流存在着内在的关联？这些问题，自非粗略浏览所能解释得清。而徐君的著作，对桑悦作出了相当周到平实的论述，使我肤浅的印象明晰起来。

桑悦籍贯本为常熟，徐君一开始就通过一些史料指出其家族与吴县、长洲诸诗人关系至为密切，诗歌精神亦与沈周等相通，并有互动（如沈周《石田翁客座新闻》中对“桑民怗嘲富翁”的评论等），故认为考察苏州诗人群体似不宜排除此人。我以为这是恰当的，无论是时间的限定，还是空间的选择，都只是一种透视角度的需要，而不应成为割裂文学生态广泛联系、作茧自缚的框架。

在具体论述中，徐君不认同因为桑悦写过一些带有诗歌复古观念的文章，就将其简单地视为明代诗歌复古思潮先驱的观点。他主张从整体上把握问题，而不是仅凭其片言只语下结论。那么，什么是整体把握呢？徐君从不同角度作了论证，他指出桑悦自视甚高，具有强烈



的自我表现欲望，喜好用夸张的方式发表言论，以期取得惊世骇俗的效果。这在他的诗论中同样有表现，其实质则是与“诗歌应自具面目”的追求一样。徐君还发现，桑悦在一些具体论诗文之作中，并不喜欢用复古派式的“格以代降”价值标准裁断文学史现象。他虽高度肯定汉魏诗歌价值，但在实际创作中，如五言古诗《感怀》五十四首等，却感觉不出它们与古朴浑融的汉魏诗歌有何关联。无论从立意还是遣词，仍然是桑悦兀傲狂放个性的表露。这种写法，在他的绝句中表现得更为鲜明，可见他对格调的轻视至少不在沈周等之下。正因为如此，不管是王世贞的尖酸讽刺，还是翁宪祥的溢美有加，都在实际上标识出了桑悦诗歌写作任情挥洒、无复依傍的基本特点。基于上述分析，徐君明确指出：“复古观固然是他诗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但它既没有在其诗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更没有影响到其自由随意的创作方法”，他的创作是一种“复古表象下的漫兴”。

从徐君对桑悦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既没有停留在奇闻逸事所呈现的磊落不羁的表象上，也没有为古人的偏见和今人的判断所局限，而是结合桑悦的创作实际，从文学渊源、理论阐述、社会背景、舆论反应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这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更为妥贴可信。而这在本书中，只是一个普通事例而已，徐君对沈周的农村生活诗、祝允明的《述行言情》组诗、苏州诗人的《落花》诗等的论述，也无不分析到位，阐释允当。

值得称道的是，徐君的研究还表现了极为可贵的理论意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对苏州诗人及其创作的分析中，书中没有停留在一般性的描述上，而是力图通过复杂的现象，擘肌分理，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例如第三章论述苏州诗人群体的两种典型心态，不仅具体探讨了它们的特征，又进一步指出两种心态的存在，也折射出专制社会中追求个性充分舒展者必然面临的两种命运。这一看法就使容易流于表面的心态研究获得了更深刻的启发性。

其次，论文力图通过对特定时段、地域的诗人研究，探讨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问题，这一意图在全书的“绪论”中有揭示、

“结语”中有总结，实际上也是贯穿全文的积极尝试。比如他说：“一般说来，如果没有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对文学现象发展阶段的划分，似不必精确到某一非常具体的年月，而只需标识其呈现出整体变化的基本时间段即可——否则，人为地强硬划分，反会造成对历史不真实的解读。而对于群体性文学现象发展阶段的判定，就更须从整体性着眼，不宜仅以个别核心人物的人生轨迹为坐标。”这对于目前学界热衷进行的个案研究有很好的提示意义。我们看到，徐君强调在准确把握所研究时段之特殊价值的同时，尽量客观地捕捉这一文化传统的动态流程。例如论文既分析了明代苏州文人文化精神的上游，又精当地指出成化至正德间，明代诗界恢复了多声共鸣的局面，为嘉靖以后更为复杂的诗坛划定了几个基本的发展方向。这些观点，不仅说明了苏州诗人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方法上，也可为同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借鉴。

尤为可贵的是，徐君还具有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因此，他的理论思考深入而不空泛，活泼而不生硬。关于这一点，读者只要翻阅一下本书对诸多诗作精彩扼要的分析就可以领略。我想强调的是，其中许多诗作在文学史上是长期被湮没于所谓名家名作的光环下的，是徐君通过大量披沙拣金式地阅读，发现并使它们重新成为作家心态、时代脉搏的生动写照，甚至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

当然，看完此书，也有意犹未尽的地方。仍以前面提到的桑悦为例，除了《感怀》诗、《和陶杂诗》，我觉他还有一些作品也是耐人寻味的，如他的《会试感怀》写尽了一个士子的辛酸，其中从细节上描写与老父、妻子、大女、次子、幼女乃至侍婢告别的情景，极为感人。“连年远行役，心死精力疲”是奔波在科举道路上士子们的共同经历；“侵晨当发脚，眷恋住移时”，是因为有太多的牵挂；而“欲求斗升禄，活此老少饥”则是内心最真实想法。此种笔墨绝类惯于述哀的归有光，类似于后者《金陵还家作》中所写为科举飘泊在外而思念亲人的心情。而桑悦的《按县》写自己“贫为微官出按县，忍作傀儡随人提”，令人想到袁宏道“作吴令，无复人理”的感慨；他的《闻邸报有感》中



“邸报云云天上堕，致政诸公春梦破”，“先生观尽今古戏，真宰讶予双眼大”，对当下的政治冷嘲热讽，又令人想到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邸报束作一筐灰”的愤慨。读着这样的诗，可以发现桑悦在特立独行的奇崛作派之外，还有另一番面目。虽然本书自有探讨的重点，但桑悦以及其他苏州诗人，本身还有丰富性、复杂性，这些丰富、复杂与他们最引人注目的精神侧面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又与诗歌发展的丰富、复杂有着怎样的关系？也许还有值得深究的地方。实际上，徐君在书的“结语”中也提到尚有许多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挖掘，例如苏州诗人创作中的诗画关系，书中虽有所涉及，却未能在更突出的层面予以讨论，多少也是个遗憾。不过，徐君既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论题仍有可以继续开拓的学术空间，以他现有的成绩和积累，我们仍可寄以厚望。

徐君是2003年来北京大学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此前，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已接受了系统、良好的学术训练，尤其是在叶君远先生的指点下，对沈周、“吴中四才子”作过较深入的研讨。来北大求学以后，顺势推进到明代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研讨，得乎自然，我个人并没有起什么作用。相反，如前所述，我本不熟悉明清诗文，但这些年来，我的学生中，先是战立忠的《明人选明诗研究》，接着是李汇群的《闺阁与画舫：清代嘉庆道光年间江南文人与女性研究》，后来就是徐君的《明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研究》，都做得相当出色。他们的研究使我不得不随着他们一起阅读、思考，并深切体会到了弟子不必不如师、教学相长的乐趣。桑悦有一篇《独坐轩记》，叙述他独坐读书、思接千古之乐。我以为，坐中有好学者数人，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其乐更加无穷。

我一再提到桑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徐君的此书，使我想到了一个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有趣问题。在徐君身上，似乎没有一点他所揭示的吴中诗人普遍的“漫兴”风格，更不用说桑悦式的“狂妄”。然而，他也并不盲从，敢立论，论必有据，以理服人，言谈行文始终保持着不温不火、朴实厚重的作风。记得他读书时，周围的同学，

电脑、网络，个个样样精通，而他在这方面却不甚在行，仍然在一字一句地读书做笔记、写心得。我曾担心这会影响他的进度，而他在不疾不徐的沉稳中，一直都踏踏实实前进，不但不迟缓，反而常领先。

《明儒学案》卷三十九还记载了桑悦的一个故事：

娄一斋高冠佩剑，所至倾仰，至姑苏，桑悦来访，引僻书相难，一斋未答，悦曰：“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道问学则未也。”一斋遂不与语。

桑悦的学问究竟如何，我无研究，无法评论。“引僻书相难”，是有失厚道的。但他意在提倡“尊德性”与“道问学”兼而有之，这还是对的。愿以此与徐君共勉。

刘勇强

2010年2月20日奇子轩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章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界高潮出现的深层原因	16
第一节 元末吴中文人群体	
——明代苏州文人文化精神的上游	16
第二节 明前期治国之道与苏州文苑发展外部条件辨	
析	31
第三节 博雅多趣与官隐相融	
——从明初延续至成化正德间的苏州文苑文化传统	52
第二章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基本情况及其与外围诗派	
之交游	87
第一节 成化至正德间重要苏州诗人传记资料、别集	
述略	87
第二节 有关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组成及分期的几个	
问题	109
第三节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与外围诗派之交游	118



第三章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个性意识及两种典型	
心态	138
第一节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个性意识	139
第二节 安隐自守、和顺圆通：对沈周心态的进一步 分析	152
第三节 张扬发露、怨怼愤激：祝允明的心态特征及 成因	167
第四章 漫兴精神：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典型创作	
观念与特征	185
第一节 漫兴精神的发抒	186
第二节 漫兴精神的调节	206
第三节 明代诗歌思潮中的漫兴精神	224
第五章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诗歌创作	249
第一节 沈周的农村生活诗	249
第二节 祝允明的《述行言情》组诗	265
第三节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题画诗	281
第四节 成化至正德间苏州诗人的《落花》诗	300
结 语	317
参考文献	321
后 记	333

绪 论

明代成化至正德年间，苏州地区^①的诗歌创作非常活跃。引领这一次地方诗潮的，是一个以复杂的师友、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诗人群体。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沈周、杨循吉、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人。这些诗人多因各种原因而长期乡居野处，其生活方式、文化心态以及诗歌观念、创作实践，均体现出相对于时代而言的独特价值。对与其人其诗相关的重要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便是本书目的之所在。

一 本书选题的基本意义

本书选取“特定时段中的特定地域”，对文学史现象进行考察。这种方法在学界早已为人所采用，但以之解决明诗史研究、尤其是明前中期诗史研究中的问题，仍有其意义。以这种方式进入明诗史，我们将有可能更为深入地理解明诗在某一时段内多样共生、复线发展的事实。而这对于丰富明代诗歌研究的视角、挖掘以往不为人充分重视的诗史现象，都是颇有帮助的。

在目前的研究中，以单线演进模式描述明诗演变的历史，是比较

① 我们须对本书所用“苏州”一词进行说明。指称本书所论诗人地域时，先人、时贤多用“吴中”。然“吴中”向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而言，所谓“吴中”，可指包括明代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等在内的江南地区；就狭义而言，它亦可指明代苏州府治下的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嘉定、吴江、崇明七县及太仓州。本书研究的诗人群体均为明代苏州府人，且基本上是苏州城附郭县吴县、长洲人，并主要以此二地为活动中心。据笔者看来，就本书研究而言，“苏州”这一地理概念，或许要比“吴中”在指称范围上更为具体、清晰。



常见的思路。概括地讲，这种模式，是将明诗史描述成以台阁体、茶陵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此消彼长为轴心的演化过程。在这个基本思路的指导下，学界对处于此轴心中的重要诗人及流派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文化心态的逐渐平稳，学界已逐渐不再采用简单的对立斗争、进化退化模式解释上述诗歌现象的更迭，尤其是不再偏激地贬低复古思潮或提升性灵派地位，而是研究它们的复杂性及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便发掘出很多在旧有思路支配下不易为人觉察的事实，使明诗史的研究显得更加平实、细致。^①而与此同时，从现代学科意识出发、注重不同学科间的交叉影响，也使人们对上述明诗演变轴心线索的理解更加深刻。例如，八九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哲学思想、社会意识与文学思潮的关系入手进行探索。尽管他们的目标并非专门针对诗歌，但是也为明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②

不过，尽管已取得可观成绩，明诗研究仍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应该看到，不同的叙述角度、叙述模式，会导致对历史事实重点不同的发掘。对于明诗研究来说，由于突出强调轴心流派（现象）的价值和功能，处于这个轴心之外的大量诗史现象便较少得到充分重视。在有关论著中，它们多被解释成某个轴心流派（现象）的分支或余响，至于其自身的源流、特色及影响，则很难得到深入的开掘。而在这样的研究方式引领下，我们更多理解到的便是明诗在一条单线上纵向演

① 这里不妨以对待复古派的态度为例。章培恒《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陈建华《晚明文学的先驱李梦阳》（《学术月刊》1986年第8期）、史小军《明代七子派与中国文艺复兴》（《人文杂志》1994年第6期）等论文，均对七子派的思想史、文学史意义作出了相当积极的评价。这一路径上的研究，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非常充分。与此同时，不少学者对明代复古运动的意义持一分为二的态度，如成复旺等《中国文学理论史》（北京出版社，1987）、袁震宇、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均可为此方面代表。

② 如马积高《宋明理学与文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韩经太《理学文化与文学思潮》（中华书局，1997）、黄卓越《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东方出版社，1997）等，均是这方面的例子。

进的历程；与此同时，却往往失去从横向视角观察特定时段内明代诗坛真实生存样态的机会。一个不难想见的事实是：秉承不同文化传统、面临不同人生困境的文人群体，不可能在生活方式、文学趣味上合节合拍；哪怕是生活在同一时代风潮之中，他们的差异也往往历历可见。而即便是他们的选择在表象上相似、在归宿上相仿，其内在动机及所走道路，也可能并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虽然客观地讲，文学史演进确实可能在长时段内呈现出一个主导趋向，但是这种趋向未必是文学史存在的唯一面貌。文学史研究也不仅仅是以整理一条逻辑清晰的单线演进线索为目的，而是要尽量地贴近文学史事实本身，对其复杂的特征进行切实把握；与此相反，对文学史脉络梳理得过于简单明了，往往要以牺牲事实的多样性、丰富性为代价。当然，重视“其他现象”，并不等于丧失全局观、丧失对文学史的整体性把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它们进行恰当的发掘，也正是为了避免整体性把握流于主观、空疏。

关注这种多样性、丰富性，我们便不能不将与上述诗史主轴共存的“其他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而非依附式的存在进行研究。这样，我们思考的问题，或许应集中在以下几点：这些“其他现象”的生长、演变是否具有主轴不能涵盖的个性？其演变节奏是否完全与主轴合节合拍？它们的存在样态究竟怎样、是否曾经预示了明诗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探讨它们，应当是文学史研究的有趣话题。

回到本题。为什么选定成化至正德这一时段，又为什么选定该时段内的苏州诗人这一地方文学群体？我们知道，在文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特征的转型期，往往因集中着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而格外值得关注，而成化至正德这几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段内，明代诗坛逐渐告别以台阁体为宗的旧主导秩序，走上探寻新主导秩序的道路。当然，明代诗界对“平庸肤廓”的前期台阁体的质疑，其实自“己巳之变”^①后即有迹象。不过，诗坛格局真正明显的变化，确

^① 正统十四年（己巳，1449），瓦剌大败明军于土木堡，英宗被俘。此事件实为明廷长期积弊必然导致的结果；部分史家视其为明史进入中期之标志。



是从成化间开始，至弘治、正德朝达到高潮的。以诗坛主轴现象为例，李东阳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选庶吉士，弘治八年（1495）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正德七年（1512）致仕。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就在成化至正德前半期这一时段内展开。而以他为主盟的茶陵派之孕育、形成，也大致以此为界；尤其是在他位居宰辅的弘治、正德初，该派活动更是进入盛期。而弘治六年（1493）李梦阳中进士，又标志着前七子派活动的开始。该派主要成员多于弘治年间中进士入京，其活动在正德年间达到高峰。茶陵、七子倡言格调，尤其是前七子派，明确地以师法汉魏盛唐审美典范为主张，在诗坛引起巨大的反响。仅就上述事实来看，成化至正德确实是在明诗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时段。

不过，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在这一时段内，为突破诗坛委顿局面而努力的，并不只是茶陵派和前七子，还有其他身处地方、并未进入王朝统治中心的诗人。面对如何让明诗重现生机这一问题，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理想；他们在实践中为明诗演进方向设计着各自的方案。我们所说的苏州诗人，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群体。成化至正德间，苏州地区的文艺活动在整体上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中诗歌取得的成绩相当突出。细究之，这一时段内的苏州诗歌活动可分为酝酿期和成熟期。所谓酝酿期，大致是在成化年间。这二十几年里，沈周正值壮年，其父恒、其伯父贞、其师杜琼、陈宽尚活跃在文坛艺苑；而徐有贞、祝颢等苏州名流又先后致仕回乡；这些隐士与居乡土绅共同促成了明兴以来苏州地方文艺交流活动的第一个高峰，为诗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至于弘治、正德间几十年，可以看作苏州诗界的成熟期。这一阶段，沈周虽进入晚年，但仍活跃于文坛，并提携大批后辈。也就在此时，苏州出现了在诗歌成就上足以与其并驾齐驱的另几位重要作家：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这也就是后世所谓“吴中四才子”。他们的祖、父辈，多是引领成化间苏州文艺活动高潮的人物，而他们的创作成就则更上一层楼。除他们几位，杨循吉、蔡羽等，也在新一代苏州文人中堪称代表。上述诸公不仅擅诗，而且

表现出在文艺领域中多方面的造诣。弘治十八年（1505），徐祯卿登进士第，改趋北方格调派。而祝允明、文徵明、杨循吉几人或因科场屡蹇，或因弃官归隐，均久居乡里。他们与沈周等人长期交往，并在正德四年（1509）沈周逝世后继续保持着苏州诗界的核心地位。回顾成熟期的苏州诗坛，我们可以看出，沈周、唐寅、杨循吉等无论在诗歌观念还是创作实践上，都具有一种典型的“漫兴”特征，而祝允明、文徵明等作家即便对形式风格问题有所考虑，也主动保持着与北方格调派的距离。这些苏州核心诗人，的确表现出卓然自立于一方的风貌（具体内容请参考第四章）。嘉靖二年（1523），唐寅病故。可以说他的文学生命基本上与弘治、正德相始终。正德十五年（1520）前后，祝允明写作堪称其晚年思想总结的《祝子罪知录》。他也于不久后的嘉靖五年（1526）辞世。而就在正德、嘉靖之交，苏州诗坛出现新的情况。一方面，文徵明逐渐开始主盟苏州风雅，在其周围聚集了王宠、陆治、陈淳、王谷祥等依然服膺其创作观的新一代创作者；另一方面，格调说对部分苏州诗人产生影响——黄省曾“改趋北学”，而此时成长起来的“皇甫四杰”，也体现出融合七子派部分观点的倾向。可以说，大约从嘉靖初开始，苏州诗坛，进入了一个分化、重组的新时期。而本书也就以正德末为考察的下限。

总体来说，成化至正德间的苏州诗人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师友和亲缘关系，有着以苏州为活动中心的长期而稳定的交游事实。第二，他们在生命气质上表现出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博雅多趣，追求缘情自适、自我愉悦。第三，他们中的核心成员，在诗歌创作观念与特征上表现出相对一致的追求。第四，他们中间，出现了确有成就的代表作家——沈周、杨循吉、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人的诗歌，完全可以在茶陵派、前七子派之外独树一帜。另外，在此时段之前，明代苏州诗界尚未产生具有突出成就的作家；而在此之后，能够代表苏州诗歌创作成就的核心作家唐寅、祝允明等先后逝世，苏州诗坛出现分化，而其整体上不同于格调派的特色反隐而不彰。

